

#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刘志峰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长安形象;韩国汉诗;长安情结;中韩文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3-0007-07

自国家产生伊始,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汉诗,汉诗作为一种基本文学样式一直贯穿于新罗、高丽、朝鲜等历史时期。650年新罗真德女王为唐高宗献上五言排律《太平诗》,收于《全唐诗》第797卷。自两汉定都长安以来,隋朝在汉长安城东南兴建新城改名为大兴,唐政权建立后又将大兴改名为长安。此后数百年间,长安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经济最发达的都市闻名海内外。

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在韩国历代文人诗文总集《韩国文集丛刊》(共500辑)当中,大量汉诗提及“长安”,粗略考察其数量超过3000首,当中包含了丰富的长安形象。何谓长安形象?长安为何会在韩国汉诗当中大量出现?韩国汉诗是从何时接受了长安,这一“长安”与中国的长安又有何差异?本文将对这些疑问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以长安形象为切入,找寻历史上中国对韩国的文化影响。

## 一、长安与长安形象

在讨论长安形象之前,首先需明确长安的含义。

长安在历史典籍中主要有4种含义:秦之乡名;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隋、唐等政权之都城;关中地区;泛指皇都<sup>[1]</sup>。前3种意义的长安是地理概念的扩大,第4种则是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延伸,恰是这一延伸和升华,才使长安不再是千百年后的残垣古迹,而成为了一种被传承的形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安形象超越了时间。唐之后的历朝都曾将首都称为长安。如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中回忆仁宗朝自己与苏辙汴京进士及第,有“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一句。南宋皇帝赵构见天降大雪担忧临安贫民说:“雪却甚好,但恐长安有贫者。”<sup>[2]</sup>元好问的《涌金亭示同游诸君》:“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第二,长安形象超越了空间。不仅在中国境内,朝鲜半岛的重要城市如平壤、开城、首尔都曾被称作“长安”,韩国、日本、越南历代也存在着大量有关长安的汉诗。日本诗人友山士德《题万年院》:“举头咫尺长安近,大道无拘任往还。”鄂隐慧巖的《寒

收稿日期:2013-12-15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2JK0270)

作者简介:刘志峰(1983-),男,吉林吉林人,讲师,文学博士。

夜留客》：“别来肝肺冷于铁，听尽长安半夜钟”等。对此，笔者难以全面考察，但韩国、日本、越南等汉字文明圈各国的汉文学中皆存有长安形象是一个事实。

第三，长安形象超越了文学体裁。从宋词、元曲到小说（如《红楼梦》）、戏剧（如《牡丹亭》），长安形象跨越了多种文学体裁并融入其中。但这不仅仅限于中国，在韩国的时调、歌辞等固有文学体裁之中也存在着长安形象。

长安作为唐都，其形象被唐诗描画记录，唐诗赋予了长安诗性，诗性使长安形象超越了时空，在文学世界里得到不断阐发，是长安形象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如果说长安形象只是文学长河中的闪光一瞬，那唐诗就是通透的松脂，将长安裹入其中凝成琥珀，使长安形象永久定格在瑰丽瞬间，千古流传。长安形象甚至出现在韩、日等国的文学之中，虽然所指城市不一定是中国的长安，但其形象仍可以看作是长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形象是一个能够引起东亚文明圈<sup>①</sup>共鸣的人文符号，可见长安影响之广。

近年长安学研究勃勃兴起，令人鼓舞。“长安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思想、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遍及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sup>[3]</sup>对长安形象进行探讨，必将对长安学人文领域的开拓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长安学虽以区域名称命名，但正如长安是国际名城那样，长安学必将是一种由本土到国际的研究，外国的流变和影响也应纳入长安学研究范畴。对长安形象进行的研究自然不仅限于中国，还应包含韩国、日本等国文学中的长安。长安形象既包含长安，也包含那些拥有长安特点、类似长安、被称作“长安”的城市。基于此，笔者尝试对长安形象加以定义：长安形象是在东亚文明圈范围内，以汉唐长安为母体，衍生出的与其相关特定城市的景观、生活、市民、风俗等一系列文学、文化形象，当中包含着人们对城市文明向往的普遍情结。以唐诗为例，李白的“春潭琼草绿可折，西寄长安明月楼”、崔颢的“长安甲第高人云，谁家居住霍将军”有关长安城市；杜甫的“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鞦马听晨鸡”，孟郊的“乘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关长安景色；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高适的“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有关长安市民与风俗。

人类向往城市文明是一种普遍的情结，当中包含了人对将权力、财富、名望、文化、享乐、安定、繁荣、便利、交流等种种生存、发展可能性集为一体的城市产生无意识的向往与冲动。长安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际都市，将这一情结命名为“长安情结”，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及说服力。“依依惜别长安陌”、“作客他乡长安日”、“醉卧漳滨长安梦”、“西出阳关忆长安”……历代诗人对长安如此种种的向往与留恋都是长安情结的最佳注脚：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王翰的《凉州词》“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等等，无一不是长安情结的最好表现。屡试不第的书生、塞外沙场的将士、和亲外嫁的公主，避乱流落的文人……求长安而不得、居长安而远迁之人，长安安定、繁荣、美好的形象，让人回首，使人怅望，令人梦中频流连，教人意气忆长安。忆长安、望长安之中，包含了人们对美好城市的普遍向往，也有着对人生无限的追问与迷惑。如此叠加了无数诗人情感经验的长安，最终成为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长安形象。

## 二、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

朝鲜半岛历史上出现的统一政权国家有新罗、高丽和朝鲜。笔者按不同历史时期对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进行具体考察。

### （一）新罗汉诗中的长安

统一新罗时期（668～935）曾有大批留学生赴唐求学，仅在唐及五代等第者就有90人之多，<sup>②</sup>但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只有崔致远、朴龙范、崔承佑、崔匡裕几位。提及长安的作品有：崔致远的《长安旅舍与于慎微》“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春日邀知友不至》：“每忆长安旧苦辛，那堪虚掷故园春。今朝又负游山约，悔识尘中名利人”，《长安春》：“烟低紫陌千行柳，日暮朱楼一曲歌。”<sup>③</sup>崔匡裕的《长安春日有感》：“麻衣难拂路

① 详见赵东一《东亚文明论》，知识产业社，2010年版。赵东一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东亚汉文儒教佛教文明圈、南亚东南亚梵文印度教佛教文明圈、西南亚北非东非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明圈、欧洲拉丁语基督教文明圈等四大文明圈。单独国家产生的是文化，而非文明。

② 详见安鼎福《东史纲目·乙酉年真圣女主三年》“送崔承佑赴唐留学”的注释中提及：“从长庆（唐穆宗年号）朝金云卿开始，至唐末科举合格者有58人，五代梁、唐时期有32人。”

③ 详见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长安春》原诗已逸，现存一联收录于日本平安时期大江维时所编《千载佳句》当中。

歧尘,鬓改颜衰晓镜新。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国芳树梦中春。”

以上几位诗人当中,以崔致远(855~?)最为著名。咸通七年(866)崔致远十二岁时,赴唐留学,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宾贡科及第,三年后任宣州溧水县尉,唐僖宗光明元年至中和四年(880~884)于淮南任兵马都统高骈从事官,后于884年时返回新罗<sup>[4]</sup>。崔致远在中国的18年中,其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在长安、洛阳求学、应试,后期在溧水、淮南(今扬州)为官两个阶段。“前期虽曾在学习之暇写些诗文,但已失传,且无具体的行踪记录,无法确考其所到处。后期有不少诗文传世,其中涉及他所到过的一些地方。”<sup>[5]</sup>虽然其在长安的行迹难以考证,但作为遣唐留学的新罗文人,其在长安生活过的事实是可以确定的。朴龙范、崔承佑、崔匡裕三人生卒时间不详,与崔致远同为“新罗十贤”,汉诗仅在《夹注名贤十抄诗》当中略有收录。朴龙范的作品中并未直接提及长安,大多为寄赠唐人之作,从其诗《早秋书情》“千绪旅愁因感起,几茎霜发为贫生;堪知折桂心还畅,直到逢秋梦不惊”中可知其在唐生活并不如意。崔承佑的生平在《三国史记》中有简短记载:“唐昭宗龙纪二年(890)入唐,京福二年(893)侍郎杨涉下及第。”其作品未提及长安。

这些新罗诗人都曾在长安留学,汉诗中的长安指的正是唐代长安,可惜诗中并未对长安有过描述,而是抒发了新罗学子淹留唐都、寂寞求学的辛苦与烦闷,长安的美好反衬出他们的思乡之情。

## (二) 高丽汉诗中的长安

高丽时期(918~1392)光宗十一年(960),开京(开城)被命名为皇都,因其附近有山名松岳山,故又称松京、松都等,高丽著名诗人林椿、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穡、金九容等均提及长安。

林椿,生于高丽文臣之家,后在武人执政时期家道没落,屡试不第,曾为“竹林高会”七贤之一,以文章闻名,39岁英年早逝,曾居住开京后辗转于尚州、襄阳等地,未曾到过中国。高丽诗人当中,林椿最早在汉诗中提及长安,作品《谢人见访》是一首描写贫困生活的作品:“长安霖雨后,思我远相过。寂寞蜗牛舍,徘徊驷马车。恒饥穷子美,非病老维摩。莫署吾门去,声名恐更多。”开京雨后有朋友前来拜访,诗人有感而发慨叹杜甫的穷苦与王维的终老。1174年林椿的作品《仗剑行》中有:“长安尘土中,高枕卧五载。恒饥已变颜色黧,牢落枯肠千卷书。”当时高丽右谏议大夫金甫当辅佐毅宗复位失败,大量文臣

遭李义方等武将杀戮,动荡的局势使林椿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离开首都流落地方,这首诗正是林椿开京生活的写照。

李奎报是高丽中期大文豪,有诗二千余首,提及长安的作品很多。考其年谱,李奎报并未到过中国,但曾读过唐史,27岁时创作了《开元天宝咏史诗》43首,其中《绿衣使者》的序中写到:“遗事曰长安富民杨崇义妻刘氏,与邻人李弇通,共杀崇义。有鹦鹉语曰,杀者李弇也,遂败。明皇闻之,封为绿衣使者。”所说的正是《开元天宝逸事》中的“鹦鹉告事”<sup>[6]</sup>,此处长安显然是指唐都长安。

李奎报29岁(1196)时,崔忠宪武人政权在开京发动政变,李奎报姐夫被发配黄骊县,他不得不带着姐姐离开开京避乱黄骊县,后又前往尚州,于该年十月又经黄骊县回到开京。这一年他创作了《古律诗九十二首》,流露出对开京生活的怀念,如《是日入元兴寺见故人珪师赠之》:“忆昔共游长安中,算来一十四春风。”《忆长安》:“长安不是天难到,漳浦沉婴泥杀人。”《宿濒江村舍》:“寄谢长安旧知己,客中双眼为谁青。”《将发黄骊有作》:“穷秋客南国,今日向长安”等。另据其年谱,李奎报32岁(1199)时:“夏六月,颁政,补全州牧司录兼掌书记。九月,赴全州……”,此年有诗题为《九月十三日发长安将赴全州临津江船上与晋公度韩韶相别》。李奎报34岁(1201)时,“春正月,至自广州,夏四月,之竹州迎母至京师”,此年有诗题为《自竹州昇母携姊将赴长安示甥婿郑生柔》,以上作品中的长安均指开京。

李齐贤曾四任高丽宰相,一生七次赴元,在中国前后生活长达12年。曾于1316年陪同高丽忠宣王前往峨眉山祭拜,中途经长安作词《木兰花慢·长安怀古》;1319年陪同忠宣王到普陀山;1320年忠宣王被贬谪,李齐贤又到大都;1321年李齐贤父去世,他返回高丽;之后又于1322年回到大都;1323年离开大都前往甘肃临洮探望被贬的忠宣王<sup>[7]</sup>。二次途经长安时,李齐贤作《题长安逆旅》:“车马函关道,风尘季子裘。辙环天下半,心逐水东流。万事唯呼酒,千山独倚楼。青云有知己,未用叹悠悠。”诗中并未涉及长安形象,但“函关道”、“季子裘”<sup>①</sup>已经说明所处地点为关中,饱含故国之思、羁旅之苦,慨叹国家之难、宦路之艰。题中的长安为元代长安。

① 战国纵横家苏秦,字季子,《战国策》卷3中有“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语,指苏秦入秦求仕,资用耗尽而归之事,后来用季子裘比喻路途、处境困顿。

李谷是高丽后期的文人,36岁(1333)参加元朝会试及第,后多次出使往返于高丽和元,其作品涉及长安的有《同禁内诸生游紫霞洞次韵》:“长安万家无所适,肯向高门低我颜。”紫霞洞是开京附近松岳山的一处名胜。李谷之子李穡是高丽末期最有影响力的文人,21岁随父亲到元大都,入元国子监;27岁获元殿试次席,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官;29岁返回高丽任吏部侍郎,后历任高丽成均馆大司成、政堂文学等。1388年李穡出使南京前后曾创作《纪事三首》,其中有“长安风雪惨愁容,独有南京花气浓”。诗中高丽首都长安与明首都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1388年2月明代政府向高丽明确要求归还元曾占领的铁岭卫以北的辽东土地,5月高丽禔王派李成桂、曹敏修进兵辽东,李、曹二人密谋后出兵并未到达辽东,而是率兵返回开京发动政变,史称“威化岛回军”,后废掉禔王,改立恭让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穡出使刚刚建立20载的大明,回想此时内乱争夺白热化的高丽政局,难掩心中苦闷。

金九容,曾任高丽成均馆大司成、判典校寺事等官职,1372和1384年两次出使中国。1361~1368年,金九容作《寄李判官》,其中一联:“寂寥西望向长安,落日孤云极目寒。”《呈权右尹其二》,其中一联:“饮尽长安百万家,满城桃李一时花。”1375~1381年被贬竹州、驪州时期曾作《醉中》:“饮酒长安兴更长,何须苦恨过年光。”这些作品中的长安都是指高丽首都开京。

通过以上对高丽诗人作品的分析可知,高丽汉诗中的长安所指代的已经不再全是唐长安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指高丽首都开京,长安已经成为高丽首都的代名词。

据现存汉诗来看,最先在汉诗中将开京称为长安的高丽诗人是林椿,但将这种用法固定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是李奎报。李奎报26岁时创作了高扬民族意识的五言长诗《东明王篇》,他反对高丽诗人效法宋代黄庭坚等致力于典故用事,而倡导重视内容创意的“新意见”(“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同时自称“古之诗人造意不造语,僕则兼造语无愧矣”,提倡“新意”需要创造新的词汇。不过,从其积极接受长安的诸多形象来看,李奎报反对高丽诗创作模仿宋诗用典的具体方法是从唐诗词汇中获取灵感。其古律诗《吴德全东游不来以诗寄之》中颈联:“黄稻日肥鸡鹜喜,碧梧秋老凤凰愁”也被后朝诗人徐居正指出蹈袭杜甫“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句<sup>[8]</sup>。李奎报提倡的“造境造

语”直接推广了长安在高丽汉诗中的使用,长安逐渐用来借指开京。李奎报的长安汉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的开京风俗,如《次韵梁校勘寒食日邀饮》中的“杏花齐拆暮春晨,正是长安斗卯辰”。斗卯,即斗鸡,《左传》中已有记载,至两汉已十分普及,隋朝《玉烛宝典》记载寒食节时“城市尤多斗鸡”,李奎报的汉诗说明高丽延续了隋代寒食斗鸡的风俗。

“长安陌”、“长安路”指长安繁华的街道,也是送别友人的场所,如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等。李奎报诗中接受了这种形象,如《路上逢故人口号》中的“握手长安路,潜然涕自零”。《忆二儿》中的“仲夏五月天,初别长安陌”等,将离别的情绪烙上了长安的印记。“长安豪侠”、“轻薄儿”也多次出现在李奎报汉诗之中,如《留醉闵判官光孝家主人乞诗走笔赠之》中的“白云居士今已衰,羞逐长安轻薄儿”。《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的“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等。长安游侠和富家公子,作为长安中特色鲜明的人群,其形象也是长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自古即有其任侠传统,唐代长安更是当时任侠风气的中心……从任侠传统的继承来看,唐代长安游侠风气表现出对南北朝侠风的融合且以南朝侠风为中的特征,其标志是都市游侠的盛行和游侠少年优游奢靡的任侠风气。”<sup>[9]</sup>秦汉时出现的豪侠、刺客是除暴安良、义重千金的任侠形象,有着显著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任侠之气成为权贵富少的一种奢靡骄纵的生活态度。“轻薄儿”与侠少意思相近,是指那些眠花卧柳、骄纵不羁的富家公子。唐诗当中多见“长安游侠”、“长安少年”,李奎报诗中“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将之前的称谓稍作加工,凸显出贵族公子的侠义与豪富;“长安轻薄儿”则专指耽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怀念长安、盼望回到长安等长安情结也出现在李奎报的汉诗中,如《己卯四月日得桂阳守将渡祖江有作》中的“命薄如今遭谪去,尚难拼却望长安”。《旅舍有感次古人韵》中的“长安何日到,目断碧天涯”都表现了诗人被贬期间对开京的向往和思念。

## (三) 朝鲜汉诗中的长安

朝鲜时期(1392~1910),太祖李成桂于1394年迁都汉阳,朝鲜汉诗中的长安也相应地由开京更换为汉阳。朝鲜时期提到长安的作品有2800余首,诗人几乎涵盖朝鲜所有重要文人,长安再一次成

为汉阳的代名词。“长安”一词的大量出现,除了朝鲜王朝统治时间较长、文集存留较多等原因外,与朝鲜中后期开始崇尚唐诗也有很大关系。韩国诗风大致经历以下发展:新罗到高丽初期,为晚唐诗风;高丽中期开始宋诗兴起,至李齐贤开始稍作改良,一直到朝鲜前期。<sup>①</sup> 朝鲜中期以后受到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之风的影响,朝鲜汉诗崇尚唐诗的风气渐浓<sup>[10]</sup>。

不过,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并非仅指汉阳,有时也指平壤。如李晔光的《即事》中“游人白马长安市,美女青楼渭水桥”一句,诗注已写明“长安,平壤别名”,渭水是流经今天朝鲜平壤的清川江和大同江的古称。再如李安讷的《平壤月夜酬赠西潭李达学官》:“樽酒长安一见面,兵戈流落十经春”,诗题已写明会面于平壤。平壤城被称作“长安”,在《新唐书》中已有记载,只不过是在高句丽统治平壤的时期。

朝鲜汉诗长安形象主要包括城市、景物、游侠、风俗等。有关汉阳城市规模的汉诗,多以“长安百万家”、“长安万井烟”、“长安万户”等形式出现,如成俔《东街偶吟》的“东风不管花无力,吹满长安百万家”,具凤龄《客居月夜柳修撰而见至》的“霜钟吼夜彻天街,月满长安百万家”等。唐诗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贾岛《望山》的“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1432 年完成的朝鲜《世宗地理志》中,记载当时汉城府(汉阳)五部(东西南北中五部 49 坊)户数 17 015 户,城底十里户数 1 779 户<sup>[11]</sup>,以每户 5 人计算,计入贵族官员军队人数,汉阳人口应不会超过 15 万。而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据推算应在百万左右,<sup>②</sup>称其百万家虽略有夸张也不为过。朝鲜汉诗也接受了长安的宏大形象,借用了此种表现。与“长安百万家”相比,李湜《寒食寄次韶二绝》的“长安万户炊烟断,禁火应怜介子推”,姜玮《除夕》的“长安万户千门里,俭岁风光扫酒旗”,当中的“长安万户”则更贴近汉阳实际人口。

朝鲜汉诗中也有不少与“长安陌”有关的汉诗,如郑澈《次梧阴示韵》的“五十六年知己非,长安陌上故人稀”,李达《洛中有感》的“长安陌上时回首,咫尺君门隔九重”,金时习《惜别二首》的“惜别长安路上时,不堪挥泪送征衣”,元天锡《许同年仲远以诗见寄分字为韵二十八首》的“为君回首长安道,斜日溟濛照远村”,既是对长安形象的接受,也是对前代诗人的继承。长安的道路既是相遇、相送的场所,也是追忆理想、感慨抱负之地,某种程度上长安的道

路与长安已经融为一体。

朝鲜长安汉诗中的自然景物有:日、月、春、花、柳等。其中“长安日”在唐诗中就已成为长安的象征,远离长安之人即便看到天上的太阳,也称之为“长安日”,聊以慰藉对长安的思念。如李白的“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岑参的“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等。朝鲜汉诗中也类似的例子,如:李达《清明日感怀》的“伊昔长安日,春游忆少年”,郑士龙《十三山》的“我行要近长安日,不是望乡那割肠”,用无论何地都可以望见的“长安日”来抚慰对长安(汉阳)的想念。“长安月”则更多是接受了李白《子夜吴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影响,朝鲜金尚宪《闻捣衣》的“遥想长安月明里,青砧素手玉关情”,尹铉《登高台》的“何处长安月,吟成子夜歌”等,都描绘了长安月下妇女捣衣劳作的景象,反映了中韩相似的日常生活。长安春、长安花、长安柳等多为直接描写长安(汉阳)景物起兴,如申叔舟《又用前韵呈咸阳兄》的“已见长安花似海,停云千里不堪愁”,等等。

朝鲜时期长安汉诗中还有一些是描写长安贵族游侠生活的,如之前对高丽汉诗的分析,任侠本是汉唐长安自古即有的传统,唐长安是当时任侠风气的中心。从高丽李奎报开始接受了唐诗《少年行》中的游侠形象,到了朝鲜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如李植《上元夜郁郁独闭效古意一篇》的“长安游侠子,杯酒相与欢”,徐居正《尹生莘德用前韵见寄复和》的“谁家少年狐白裘。快马日日长安游”,权諤《长安侠客》的“长安侠客好男子,少小游荡纵逸气”,徐居正《三和八首》的“莫数长安轻薄子,翻云覆雨苦纷纷”,柳方善《至日自赋二首》的“长安多少繁华子,梦想风流醉盃簪”,等等。唐诗中的长安游侠可以分为:权贵侠少、禁军侠少和市井恶少等,其中权贵侠少的游侠活动是唐代游侠的主流,而此种游侠生活完全是一种炫耀世俗享乐的行为。从游侠子、少年、侠客、轻薄子、繁华子等称谓来看,朝鲜汉诗中接受的主要为“权贵豪富侠少”形象,突出描绘其豪富

① 详见金宗直《青丘风雅》,以会文化社,2000 年版。“宗直自学以来,往往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名家者,不啻数百,而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初初,专习晚唐,丽之中叶,专学东坡,迨其叔世,益斋诸公,稍变旧习,裁以雅正,以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

② 中日有关盛唐都城长安人口的研究十分丰富,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推测 8 世纪前半期(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总人口数约为 70 万,其后学者气贺泽保规对长安城中军人数量,以及忽略了从事生产的人口,因此“8 世纪前期长安盛世时代,人口有达到 100 万的可能”。中国学者武伯仑、张永禄的研究中也指明长安人口为 100 万左右或超过 100 万。

侠义、纵酒享乐的一面。

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最为耐人寻味的当属以节日风俗为题材的汉诗,但当中许多又有不同于中国的风俗。笔者将其视为长安形象在异域的一种嬗变。中韩传统节日近似,但风俗却不尽相同。朝鲜汉诗中提及元日、上元、上巳、寒食、清明、端阳、七夕、秋夕、重阳、腊日、至日等古时重要节日,当中许多风俗与中国近似,如元日祭祀、上元踏桥、上巳沐浴、寒食戒火、七夕乞巧、秋夕赏月、重阳登高、至日闭户等。具体汉诗举例如:李湜《元日》“十里长安道,卖痴人竞呼。朝颁新玉历,门换旧桃符。邻竹三更爆,乡雉数队驱。病夫惊老大,最后饮屠苏”,金昌翥《上元夜终南独眺》“今夜少年金凤曲,谁人先踏锦川桥”,金履坤《上元雨》“寒雨滴滴广通桥,桥上桥下人如雾”,李湜《寒食寄次韶二绝》“寒食风光似旧时,花枝蕾蓄草如丝。长安万户炊烟断,禁火应怜介子推”,南龙翼《七夕夜会走笔应呼》“长安一雨洗新秋,梦入清江江上洲。骚人有感木叶落,牛女相逢天汉流”,具莹《秋夕》“长安秋夕意如何,独坐茅檐鬓欲华。遥想阿咸扫墓地,满山松柏夕阳多”,李种学《九日》“快晴更欲登高去,回望长安倒一樽”,柳方善《至日自赋二首》“至日关门独自眠,客中身世正堪怜”等。

此外,朝鲜也有一些特有风俗,如元日为儿童穿上五色彩衣,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五色彩衣源于朝鲜人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他们用五种颜色的布料代表五行,裁成儿童穿着的长袍和上衣,用以辟邪,保佑子嗣平安<sup>[12]</sup>。李安讷《甲辰元日时伯兄氏奉慈侍来自孟山仍留于郡》的“五色斑衣稚子舞,磨云岭外即长安”,其中说的“五色斑衣”指的就是五彩衣。上元踏桥也是正月十五的重要风俗,从唐代开始上元已有“走桥”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金昌翥、金履坤的长安汉诗中就有汉阳上元节“踏桥”的内容,只是诗中提到的“锦川桥”和“广通桥”是分别位于汉阳昌德宫进善门外禁川和汉阳广通坊的石桥。风俗虽然相同,但长安形象当中已经加入了异国元素。

北宋张先曾在《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中写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可见当时已有寒食女子荡秋千的风俗。但在朝鲜长安汉诗中,除了寒食、清明以外,端午节也是女子荡秋千的重要节日,成俔《在铁原逢端午》中描绘的“遥想长安千树底,几人撩乱竞秋千”的场景何尝不是另一种韵味的长安呢。灯夕观灯也是朝鲜长安的一种独

特风俗,原与中国元宵节同为正月十五,高丽武将崔怡掌权时(1219~1249)将四月初八改名“燃灯”,之后便有了四月初八观灯的习俗。这一风俗在长安汉诗当中多有提及,李景奭《灯夕抒怀》中有“长安旧俗重观灯,不于上元于四月”句。随着长安被朝鲜诗人接受,这些与中国相异的风俗也成了长安形象的一部分。

作为长安形象的组成部分,韩国汉诗中的长安也同样包含着长安情结,长安情结在朝鲜时期通过更丰富的作品得以充分表现。这种内在情感源于人们对城市美好的向往,如申光汉《宿沃原驿》的“身远尚堪瞻北极,路迷空复忆长安”,徐居正《登村墅后岭》的“回头北望长安近,落日苍茫任去留”,朴仁老《述怀》的“圣恩未报头先白,西望长安泪湿巾”,柳得恭《东还后送曾若游岭南》的“遥忆天南留滞客,岭梅开遍梦长安”,不胜枚举。

长安作为9世纪前世界最大的国际城市,集聚着世界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皇权、功名、财富、诗名、侠义、享乐等一切欲望都能在长安之中得以憧憬与追逐。这种内在情感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目的,而是一群无意识的组合,是一种强烈的无意识冲动,是一种情结,直到现代它依然驱使着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向更大的城市,促使着更大规模城市的诞生与更新。

## 三、长安形象中的中韩文化关系

以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曾如此描述形象:“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sup>[13]</sup>长安形象对于韩国历来说本是一个异国形象,后来逐渐被认同为一个本国形象,直到今天韩国语中仍然保留着“장안화제”(长安话题,意为首都之中人人关注的话题)这样的词汇。而这种接受过程本身包含着中韩文化的交流关系。

根据前面的考察,新罗因与唐处于同一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汉诗多为新罗遣唐留学生所作,当中的长安即唐都长安,内容上多为酬和之作,对长安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一方面由于大量作品散逸,另外也是由新罗文人在当时唐代社会的生存需要决定的。新罗文人对长安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感叹于长安的美丽繁荣,又被困窘生活及思乡之情所累,无心

欣赏长安的繁华胜景。统一新罗建立后,其国内实行的依旧是被称为“骨品制”的世袭制,这导致许多中层贵族子弟为了得到重用,不得不赴唐留学考取功名,崔致远就是其中之一。新罗的统一是依靠唐的军事介入而得以完成的,新罗赴唐留学的文人难免会有寄人篱下的凄凉之感,这样的情绪在汉诗中也有流露。

最早将首都称为“长安”的是高丽时期的诗人林椿,并在其后的李奎报汉诗中大量出现,后来被广泛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高丽王朝始于 918 年,亡于 1392 年,为何会在林椿、李奎报生存的年代才开始接受长安呢?笔者以为其直接原因正是 1127 年北宋的灭亡。

唐代和宋代是中国国力、文化最为强盛的时期,作为中华“天下秩序”的积极拥护者,新罗、高丽积极接受中国文化。北宋建立之后,962 年高丽向宋派遣使节,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由于辽对高丽的多次侵略导致往来中断,高丽文宗时期(1071)再次恢复了外交关系。1127 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高丽也转而向金称臣。此时的高丽已经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人水平颇高。高丽文宗时的朴寅亮在 1071 年和 1080 年两次出使中国,其诗《泗州龟山寺》在北宋名噪一时,宋人赞其诗“尤精”<sup>[14]</sup>,甚至将其文章整理成《小华集》刊印发行,惜未传世。这一时期宋与高丽饱受辽、金侵扰,军事方面难以对抗,转而强调文化方面的“华夷差距”和文化实力。因此北宋灭亡后高丽虽向金称臣,但在文化方面依然自称“小中华”,保持了对唐宋“中华意识”的接受和传承,其体现之一便是在汉诗中称其首都开京为长安。

朝鲜汉诗中长安形象得以发展的原因除了对高丽的继承以外,更在于朝鲜时期汉诗风格的转变。朝鲜中宗(1488~1544)、明宗时期(1543~1567)汉诗文坛开始逐渐疏远宋诗,推崇唐诗文学风,到了宣祖时期(1552~1608)唐诗风已宛然成形。朝鲜金昌协曾评价本朝诗风:“至穆庙之世,文士蔚兴,学唐者寝多”。<sup>①</sup>当中提到朝鲜诗人在宣祖朝前学习宋诗,到宣祖时期已开始学习唐诗,并且受到了明代王世贞、李攀龙的影响。虽然金昌协本人对此诗风转变持否定态度,但其中可见朝鲜中期对唐诗的推崇。因此,朝鲜时期的诗风转换还是根源于明与朝鲜两国的文化影响接受关系,长安作为唐诗的重要符号,自然也被广泛的提及使用。

## 四、结 语

从诗人、作品等方面考察了韩国新罗、高丽、朝鲜时期汉诗中的长安形象,特别是从高丽中期开始用长安指代高丽首都开城,之后的朝鲜汉诗中也沿用了用长安指代首都的用法,这种对长安含义的继承隐含了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传承,体现了韩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长安形象看似细微,却如同一段棱镜,折射出了中韩百余年的文化关系。

### 参考文献:

- [1] 李世忠.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2):18-19.
- [2] 周密. 梦梁录·武林旧事[M]. 傅林祥,注.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 [3] 李炳武. 长安学总论[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1):1-13.
- [4] 李黄振. 崔致远出生年份及其及第年龄再考论[J]. 铜仁学院学报,2011,13(1):21-25.
- [5] 韦旭升. 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66-76.
- [6]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 丁如明,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 柳己洙. 李齐贤及其词之研究[D]. 香港:香港大学,1991.
- [8] 徐居正. 东人诗话[M]. 首尔:学友社,1980.
- [9] 汪聚应. 唐代侠风与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0] 金甲起. 诗品格论之正宗大家论[J]. 韩国文学研究,2008(34):295-297.
- [11] 民族文化促进会. 国译朝鲜王朝实录第五辑:世宗地理志[M]. 首尔:System 株式会社,1995.
- [12] 朴宣映. 岁时服饰的意味和象征研究[D]. 首尔:中央大学,2012.
- [13]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孟华.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J]. 中国比较文学,1998(4):79-90.
- [14] 王辟之. 渑水燕谈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下转第 37 页)

<sup>①</sup> 金昌协《农岩集》卷 34:“世称,本朝诗莫盛于穆庙之世。余谓,诗道之衰,实自此始。盖穆庙以前为诗者,大抵皆学宋。故格调多不雅驯,音律或未谐适,而要亦疏卤质实,沉厚老健,不为涂泽艳冶,而各自成其一家言。至穆庙之世,文士蔚兴,学唐者寝多,中朝王李之诗,又稍稍东来,人始希慕倣效,锻炼精工,自是以后,轨辙如一,音调相似,而天质不复存矣。”